

简牍整理研究的现实困境与简牍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苏卫国¹, 王文涛²

(1. 鞍山师范学院 政史系 辽宁 鞍山 114007; 2.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 自 20 世纪前叶发端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 至今已有长足的发展。但随着简牍出土数量以及各方面研究成果的持续增加, 传统的整理研究方式受到空前的挑战, 诸如编号、释文等信息的混乱错杂、形制、格式等信息获得不易、同类、同质信息分布零散、补正、校记、拾零不易统合等困局亟待突破, 因而数字化已经是大势所趋。而目前已有的简牍数字化产品水准尚与古籍数字化主流存在一定差距。因此, 打破简牍整理研究多元主体之间的藩篱, 积极探索良性发展的合作模式, 尽早制定出系统、规范、全面的数字化标准, 谋划高水准的深层数字化产品, 才是更恰当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简牍学; 数字化; 信息规范

中图分类号: K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11)06-0022-04

当今社会, 信息科技的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中, 数字化是这项技术得以高效采集、处理、传播海量信息的一个关键前提。信息技术的魅力, 让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们心动于利用它来解决眼前棘手的问题。简牍学界自不例外, 而且面临的困境是尤其突出的。

一、简牍学者的现实困境

简牍的出土、整理和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前叶, 是在经历了新材料带来新认识的短暂欣喜之后, 这些数量巨大、类型庞杂、信息残缺、释读不畅的新史料就困扰着一代代的整理者和研究者, 考验并锻炼着人们的智识和毅力, 笔者也是受困者之一。对这种现实困境,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 编号、释文等信息的混乱错杂, 利用不便

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发展较早, 受信息不畅以及外部环境动荡等条件的影响, 研究成果呈现个性化的多途发展格局, 编号、释文、编排与分类均有所不同, 利用起来十分不便。比如, 最初的敦煌汉简就有斯坦因编号、沙畹、马伯乐编号、王国维、张凤编号等, 后来《疏勒河流

域出土汉简》《敦煌汉简》出版时又重做编号。居延汉简的早期成果并不太注重编号的使用, 如在陈直先生的作品中, 对劳干释文的称引使用的是卷数或页数的方式, 在整理进一步规范后, 又有《居延汉简甲编》则一改通行的出土编号而用著录号的作法, 多年后《乙编》以及《合校》的出版并未沿用这一作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关研究成果在称引简号时不统一的混乱局面。与编号不统一的问题相比, 释文的问题更是如此,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的出版是说明这一状况的最好注脚。细心比对, 我们还会发现各种出版物在简牍数目上不尽相同, 比如《合校》对于很多无文字的简并未收录(包括图形简、字迹非常不清楚的或仅存个别笔划的无法辨认的简), 这又是不同编排原则所致, 虽然总体差别不大, 但取舍之间也是很头痛的。此后出土简牍的整理与研究, 虽然在规范程度上有所提高, 但经常由于发布组织、发布渠道、发布方式和发布目的不同等因素, 使得多途发展的混乱局面依然存在。例如, 云梦龙岗秦简释文出过两个版本; 悬泉简在《文物》发布释文选后, 又有《释粹》的出版; 银雀山汉简有释文本, 亦有标点注释本, 等等。总的来讲, 不同成果, 均各有专长, 不宜轻易抛弃。道理虽是如此, 但利用上的困难总是无法绕过的。

收稿日期: 2011-07-25

作者简介: 苏卫国(1972—), 男, 辽宁开原人, 历史学博士, 鞍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王文涛(1956—), 男, 河南潢川人,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 形制、格式等信息获得不易 统合困难

通常,整理出来的简牍释文都通过特定的排版或使用一些特殊的符号标记来反映简牍的文书格式信息,但有时受纸质出版物排版限制、整理者不同的整理规则影响,仍然会有一部分信息会流失,即使有注释的说明,其直观程度仍然有限,初入门者对其尤其不敏感,这不仅制约着读者的理解,还容易导致认识错误。而有了图版则不然。张俊民先生在《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研究缘起》一文中提到“日本的学者曾经主要以居延汉简的研究为题,将日本的简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是以1957年劳干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并传到日本为标志。在此之前的研究因为没有图版可供参考,只能停留在文字与文义的理解上,无法从简牍形制、文书格式和书法风格上对居延汉简进行综合研究。”^[1]⁷⁶这种情况对于国内的学者也是适用的,原因是简牍图版获取的成本远高于释文的获取。即便可以看到图版,在便捷程度上也是大打折扣的。因为通行的出版物上,图版与释文往往是分开的,有些还需要参与附表来查找图版的位置,那么,比对图版无疑加大了整理和研究者的工作强度。如果做不同方案的拼接或编联的话,成本会进一步增加,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很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而将研究工作的重心转向他处。由于仅见于附表,一些简牍的出土地信息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内容,而往往简牍内容与出土地是关联密切的。有时,我们能从出土的信息看出简牍内容的更多内涵,陈公柔、徐苹芳合著的《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2]但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梳理简牍出土地信息的辛劳。一般说来,研究视线或关注点的往返跳转,不利于信息的统合,而要强行统合,势必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三) 同类、同质信息分布零散,妨碍灵感聚合

简牍材料虽然可以将历史新鲜、生动地呈现,但认识和还原这一过程并非易事,因为简牍材料不是完整的历史记录,大多是残存的部分、碎片。因此,早期简牍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于简牍的分类和归纳,由此来澄清认识。实践证明,在以万为单位数量级的简牍中爬梳,是件苦差事,由于简牍的原始状态大多已经被扰动,所以同类、同质信息往往不是连续出现的,而是散布于不同的

个体中,尤其是字迹出现残缺或漫漶不清时,则变成了隐性信息,需要借助间接的信息来使其得到揭示。简牍的同类、同质信息分布零散,在阅读上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历时性,标注、抄录或心得在纸质媒介上的位置也就随之隔开了距离,思路自然是不连续的。偶或联想到,回忆、翻找也是颇费周折。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感受,在艰苦的阅读与搜寻中,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意图作大,然而,在往复浏览、思维频繁跳转中,这一想法渐被淡忘直至被消磨得无影无踪。百年来的简牍整理研究史中有太多这样的流逝,当然也沉淀下不少有效的灵感聚合。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成果的不断积累,以往的成果也面临着被淡忘的结局,结果导致后人在欣欣然于个人的奇思与珍获后不久,发现这片领地并非仅有一人开拓过。那么,怎样去克服这种流逝或淡忘,最大化、更有效地聚合灵感,便成为不少简牍学者由来已久的心结。

(四) 疲于跟踪的补正、校记、拾零

新出简牍的释读整理出版,往往是整理者与编辑辛勤劳动的结晶,其中组织几位专家、遵循一定的体例、反复加以讨论、校对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尽管如此,最终的成果总会留有或多或少的遗憾,而这些遗憾只能通过补正、校记、拾零等方式加以弥补。但这种弥补方式因出土和出版的简牍数据分散于各处,数量也有多有少,编号上也不连贯,以个人力量来搜寻跟踪这些信息,实非易事。而且这类信息也极易被简牍研究新人和对上述问题不敏感的研究者所忽视,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一方面一些错误已被更正,一方面错误释文又通过研究者的成果在传播。少量的这种问题,可能并不影响最终结论,但长此以往,此类结论的累加,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方向出现偏离。实际上,每位研究者都是希望能以最接近原貌的释文为研究基础的,但是,让许多人去做同一种琐碎的重复性劳动,无疑是人力和财力极大的浪费。

二、当前简牍数字化进程的不足

以上所列的困境现象虽然并不是全部,但从中可以看出,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用手工方式进行简牍整理研究的手段有莫大关联。在手工操作较小量的数据时,可信度高是其优势,但是,当简牍累积到一定数量,就会出现整理和研究进程缓慢、顾此失彼进而易出错的劣势。要解决

上述问题,提高简牍整理研究的质量和效率,最佳对策就是简牍信息存储、加工处理的数字化与自动化。

目前,已经有数种简牍数字化的产品问世,以港台为多,推出以后,确实为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其中,起步较早、较成规模的当属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简帛金石数据库”,^[3]特点是涵盖内容比较广,可以实现全文检索,从而满足研究者简单的海量信息查找和筛选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围绕收藏简牍而建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简牍数据库”也很有特色,汉简基本数据、释文以及彩色照、红外线照、反体照等数字影像信息的提供以及整合地理信息系统时空信息的做法,都有可赞之处。香港中文大学以软件形式发布的“竹简帛书数据库”也以全文检索见长,优于前者之处在于检索结果的浏览方式更直观,还附有字频统计等功能。但所收简牍史料有限,且安装使用有一定条件限制,使用者并不多。同为香港中文大学所出的“嘉禾吏民田家荊数据库”和“郭店楚简数据库”,在功能上有一些改进,增加了“出土编号”“人名”“地名”“年代编号”或“篇名”“内容”等几项检索选项,并配有造字表,易用性不错。武汉大学简帛中心建有“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将文字学作为主要关注点,以出土楚简为主,能够检索字形是其特色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三个简牍数据库均是围绕较为单一的主题来建设的,所收内容相对较少,规模效应有限,用户群体也不多。

将上面列举的简牍数据库的功能和上述简牍学者的困境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这些简牍数据库对于简牍研究困境的响应与我们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以“简帛金石数据库”为例,其简单的文本检索局限很明显,很多信息在检索结果中并不具备(如出土地、版式、书写者笔体等)。“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简牍数据库”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但所涉及的范围毕竟有限;因仅有简文内容查询,因而无法通过编号、出土地、书籍主题等方式展开,所以一旦释文有所不同或是中间加入了排版中的转行符,那么同类简牍的不同版本就不一定在检索结果中全部出现,信息的有效关联就被截断了。检索结果中虽然对原书排版格式有所反映,但可参考性不大,基本还要核对原书才能放心使用(这方面“竹简帛书数据

库”要好一些)。还有,由于出土简牍的文字内容多有残缺,许多本来十分相关的简无法在简单检索结果中看到,其中的自造字更制约了检索的范围。

已有的简牍数字化产品与早期的一些大型的古籍数字化产品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第一,就是整体内涵文字的数字化,信息单一,缺少精细的加工,没有权威性,只能满足基本的海量数据的初步筛选需求,还无法取代纸质书的优势地位。使用者虽然省却了前期翻阅之劳,但之后的繁琐比照、核对等工作几乎没有减少。第二,简牍数字化还在前期发展阶段,建设力量分散,缺少整体规划、全局考虑,建设机构彼此沟通少,标准不一,重复建设比较普遍,相互之间不兼容。这种局面对于简牍数字信息的利用效率也有一定影响,使用者不得不在多种简牍数据库中去权衡选择,每接触一个都要花费时间去学习适应。

就在几年前,胡平生先生在《论简牍整理国家标准的制定》一文中还有过这样的呼吁:“如果能够使用现代高科技手段,采用数码信息技术将所有的出土简帛拍成高清晰的数码照片存储在数据库中,管理者、研究者和鉴赏者都能分级通过网络看简帛的图像数据和相关的研究资料,势必大大提升简帛保护水平,大大推动简帛文献的研究和利用。”^[4]由此,我们能够看出现实需求与技术产品的差距确实是很大的。我们不能说这是什么新创意,它应该已经在简牍学者的心中涌动了多年,有了一些雏形,又几度夭折,但真正落实起来,确确实实是一件很难推进的事情。然而,这一呼声却着实反映广大研究者对简帛数字化的要求。

三、从当前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看简牍数字化发展的方向

时至今日,古籍数字化工作已经较早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光产品越来越好,相关的研究讨论也日渐深入。以此为参考,我们认为简牍数字化的工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

(一)在对数字化对象内涵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加紧确立相对统一的标准,以此来推动简牍数字化工作的良性、有序发展。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的历程证明:标准的制定对于古籍的数字化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信管学院学者王立清等所著的《港台地区古籍数字化现状分析及启示》,^[5]在总结港台地区古籍数字化给我

们的启示中提到,把“有效规划,统一标准”列在了第一位。合理的简牍数字化标准是数据完整性与精确性的保证,技术上也方便流通与交换共享,并有利于数据库的后续扩容与协同。标准的制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它是多方长时间合作、交流与碰撞的结果。但一旦标准确立,上述的一些困境(比如编号混乱、标点标识不统一等)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研究者的探索之路将会平坦许多。

(二)突破简牍数据简单数字化,向“深层数字化”发展。在2005年11月举行的第三届两岸四地中文数字化合作论坛上,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张轴材在《中文典籍数字化走向之蠡测》一文中,^[6]提出了“深层数字化”的概念。当然“深层数字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还未形成一定的原则规范,但数据的多元组织应该是核心问题,即数字化不是纸质书籍原版的简单数字化再现,而是融汇了对数字化对象内涵的发展性揭示的再创造。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经数字化后的实体成果将会给用户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服务。简牍数字化的努力如能实现这一目标,将会有效地淡化简牍研究者的现实困境感。

(三)协调好数字化工作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在众多已具有一定规模的古籍数字化项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其发展机制是很复杂的,里面实际是有多元主体在发挥作用的。^[7]可以说,多元主体的有效合作与协同,是简牍数字化项目成功的

关键。简牍数字化工作实际也有发掘收藏单位、整理者、出版单位、研究机构、主管单位、研究个人等多元主体。那么,面对如此浩大繁重的简牍数字化工作,如何调动多元主体来积极参与,共同促进工作的良性稳步推进而不致夭折是很重要的。以解决大家共同的困境与要求为前提,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发挥各自优势,以简牍数字化的全局为重,共建共享,是值得探索并亟需开拓的一条简牍数字化之路。

参考文献:

- [1]张俊民.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研究缘起[C]//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简牍学研究(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 [2]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J].文史,1982,(13).
- [3]陈爽.利用国际互联网络检索简帛金石数据[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1).
- [4]胡平生.论简牍整理国家标准的制定[C]//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5]王立清.港台地区古籍数字化现状分析及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06,(8).
- [6]张轴材.中文典籍数字化走向之蠡测[EB/OL].
<http://www.unihan.com.cn/Papers.html> 2006.
- [7]王立清.关于多元古籍数字化主体的探讨[J].图书馆学研究,2011,(7).

(责任编辑 陇 右)